

舊檔案、新材料——

中研院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現況

劉錚雲*

史語所現藏明清檔案是原內閣大庫流出檔案中的一小部份。本文旨在介紹這七十年來史語所整理這些檔案的經過與內容。

從民國十八年迄今，史語所的檔案整理工作經歷了四個階段。到本年六月底為止，已完成檔案登錄的有十五萬四千多件，完成掃描的有五萬八千多件，寫完提要並上網的有九萬八千多件。目前研究者可以經由網際網路 (Internet) 來檢索提要，並可在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透過印表機印出已有數位影像檔的部份。

史語所藏三十一萬多件內閣大庫檔案的內容頗豐，包括內閣收貯的制詔誥敕、題奏表章、史書、錄書、塘報、黃冊、簿冊、朝貢國表章，以及內閣各廳房處的檔案、修書各館檔案、試題、試卷、瀋陽舊檔等，其中以題奏本章佔最大宗。由於這些檔案內容多涉及一般行政事務，而有些並不見於會典或則例，是研究制度史相當有價值的材料。然若有新的問題提出，相信社會、經濟史學者也可在其中找到新的研究材料。

關鍵詞：內閣大庫 明清檔案 史語所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一、前言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目前所藏明清檔案是民國十八年由藏書家李盛鐸手中購入原內閣大庫流出檔案的一部份。這批當年險成還魂紙的檔案在史語所一待就是七十個年頭。這七十年來史語所的變化不可謂不大，首先所址由廣州、北平、長沙、昆明、李莊、南京而至楊梅，最後落腳南港，而內閣大庫檔案的收藏也從八千麻袋變成了一百個木箱。值此史語所成立七十周年之際，感謝《新史學》提供篇幅，得以簡要介紹這批檔案的整理現況。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學者利用這批資料，使得這批當年與史語所努力建立新學術關係密切的檔案能繼續對學界有所貢獻。

內閣在清初為國家庶政重心，雍正以後，其權力雖然為軍機處所分，但仍為承宣制誥典冊之府，而中央與地方官員在密奏承旨之後，國家政事仍須循正式公文管道具題，由內閣發交各部院執行。內閣大庫就是它收藏書籍、詔敕、題奏表章等檔案的場所，這批內閣大庫檔案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而也由於這批檔案的出現使得原本深埋清宮中的檔案得以公諸世人，無怪乎在本世紀的二、三〇年代，王國維將這批檔案與殷墟甲骨文、漢晉簡牘、敦煌千佛洞卷軸、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並稱五大新發現。¹

內閣大庫檔案的故事喚起人們對檔案史料的重視，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固然無庸置疑，然對於史語所這個剛創立的史學研究機構而言，內閣大庫檔案的購入與整理其實有另一層意義。民國十八年八月

¹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收入佛雛編，《王國維學術文化隨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頁286-292。

間史語所由李盛鐸手中購入大庫檔案，這距史語所正式於廣州成立剛好一年。²傅斯年先生創立史語所的目的，即在結合一群與他有相近史學觀點的學者從事「集眾式的研究」，共同來實踐他的新史學。³傅先生本人及他從各地找來的新學者如陳寅恪、李濟等人對於新史料都極為重視。陳寅恪在給傅先生的信中就說：「蓋歷史語言之研究，第一步工作在搜求材料，而第一等之原料為最要。」⁴在他們眼中，檔案就是第一等之原料。因此當藏書家李盛鐸有意出讓檔案時，傅先生很快就在十七年九月間去信蔡元培先生，請他設法以大學院的名義買下，送給中央研究院，而由中研院責成史語所負責整理。他在信中並透露，滿鐵公司曾「將此件訂好買約」，後來因為馬衡的阻撓，而未能成事。同時，由於當時的燕京大學也有意購買，他強調，「此事如任其失落，實文化學術之大損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擱筆。且亦國家甚不榮譽之事也。」⁵同年十二月間透過馬衡的介紹，史語所開始與李氏洽談購買檔案之事，十八年三月議定以二萬元成交。⁶這批原本奏准焚毀的檔案幾經轉手，最後歸史語所收藏，無疑為史語所前輩所倡導的發掘新材料，利用新方法，研究歷史的新史學提供了一個實

² 史語所係民國十七年三月設籌備處於廣州中山大學內；同年七月籌備完成，遂正式成立；十月二十二日遷入廣州柏園，始有獨立所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介》（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5），頁11。

³ 王汎森，〈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衝突〉，《新史學》8.2（1997）：94-95。

⁴ 《史語所公文檔案》元字第4卷中；引文轉引自王汎森，〈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頁106。

⁵ 李光濤，〈記內閣大庫殘餘檔案〉，《大陸雜誌》11.4（1955）：5-9；11.5（1955）：22-28；11.6（1955）：22-26，後收入氏著《明清史論集》下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頁499-526；引文見頁525。

⁶ 史語所元檔，陳寅恪信函第六號。

踐的機會。

二、內閣大庫檔案的流出

這批檔案流出內閣大庫的經過這幾十年來已有許多人談論過，其中以民初羅振玉所述最詳，因為他親身參與檔案的搶救。他指出，光緒三十四年冬，宣統年幼登基，醇親王攝政監國，於是令大臣於大庫中搜檢清初攝政典禮舊檔，閣臣由於找不到，因而以舊檔無用，奏請焚毀，且已得旨。在此同時，也有人在檢拾自己及名人試策時，檢得宋人玉牒殘葉。章梈將之影照分送同好，並呈給當時以大學士軍機大臣管學部事的張之洞，張之洞後來在一次午飲中請教羅振玉。羅振玉表示即《宋史·藝文志》之《仙源集慶錄》與《宗藩慶系錄》，並指出內閣大庫即明文淵閣舊址，藏書必多，請張之洞詢其僚屬。結果，果然有文淵閣藏書，但多殘破無用。羅振玉隨即進呈《文淵閣書目》，並告訴張之洞，雖然殘破，仍應保存。大庫既然容不下，何不奏請歸學部保管，將來可存放圖書館中。張之洞同意，於是具奏請將書籍歸部，並要羅振玉時時至內閣相助。有一天，羅振玉至內閣視察庫書時，發現大庭中堆積紅本題本，「高若丘阜」，而且多依年月順序，結束整齊。他隨手取二本來看，一是管幹貞任漕運總督時奏的本子，一是阿桂征金川時奏的本子。一問之下，原來這些都是奏准待焚之物。羅振玉回學部後，即透過侍郎寶熙，再向張之洞力陳該批史稿的重要。張之洞因而要羅振玉速將檔案移入學部。由於數量龐大，「非木箱五六千不能容」，無論移部或保存，所費實多，而學部經費有限，羅振玉又不願意再向張之洞求援，以免橫生枝節害事，因而在會稽司長宗梓山的幫忙下，以有小破洞無法盛米的米袋裝檔案，陸續移部，存放

國子監南學敬一亭，一共是八千袋，所費僅及木箱的十分之一。⁷

王國維也著〈庫書樓記〉指出，宣統元年大庫年久失修，庫牆倒塌，部份書籍、檔案及實錄、聖訓被移出，以便修繕庫房。實錄、聖訓移內銀庫暫藏，書籍由學部圖書館接收，其餘檔案則以「舊檔無用」奏請焚燬。後因羅振玉偶然發現這些檔案極具史料價值，乃請當時以大學士軍機大臣管學部事的張之洞奏請罷焚，將這些檔案移歸學部，分藏國子監南學與學部大堂。⁸有趣的是，王國維這段簡要的敘述在經過徐中舒的引用後幾乎成了內閣大庫檔案流出的經過的「標準」版本了，⁹羅振玉的親身參與的自述反而注意的人不多。

然而，這批檔案的厄運並未因此而不終止。民國二年教育部設歷史博物館籌備處於國子監，接管這些檔案。籌備處的工役對研究沒興趣，雖然他們沒有偷檔案，但卻常常將麻袋中的檔案倒出，拿麻袋去賣錢。這些被倒在地上的檔案就成了籌備處警察生火時的最佳火引。至於對檔案有興趣的學士大夫們眼光都集中在夾雜其中的宋版書。時任教育部長的傅增湘就曾派員幾十人，「大學整理」這批檔案，目的就是要找宋版書、宋版殘葉。經過了這一番的「整理」，不再發現宋版書後，在那些官員眼中，這批檔案也就毫無價值可言，可以任意處

⁷ 以上所述，見羅振玉，《集蓼編》，頁 25-27，收入《貞松老人遺稿》甲集之一；另見羅福頤，〈清內閣大庫明清舊檔之歷史及其整理〉，《嶺南學報》9.1：140-141。

⁸ 收入《觀堂集林》，卷 23：20-30。

⁹ 徐中舒，〈內閣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明清史料》甲編首本序；〈再述內閣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4(1933)：537-576。本文亦曾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檔案的分析〉為題，發表在《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2.2(1934)：171-221，原題則成為副題。鄭天挺，〈《明末農民起義史料》序〉，收入氏著《探微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289-301。

置了。¹⁰民國十年歷史博物館因為經費短絀，就將檔案中比較破碎的部份，以四千元賣給同懋增紙廠作還魂紙。由於有人將部份檔案攜出紙廠，在市面上求售，為羅振玉知悉，於民國十一年二月又以一萬二千把檔案買了去，再度將這批檔案由毀滅邊緣搶救下來；其後並雇人檢視，就檢得部份印成《史料叢刊初編》十冊。¹¹民國十三年，羅氏留下一部份，把其餘的檔案以一萬六千元又賣給了李盛鐸。¹²後來李氏無力維護檔案才由史語所購入。

三、檔案整理經過

民國十八年五月，史語所由廣州遷北平。七月教育部應傅所長之請將歷史博物館撥給中央研究院，並委託史語所管理。¹³八、九月史語所陸續將李盛鐸分存北平、天津兩處的檔案運存歷史博物館午門樓上，九月底即開始在午門西翼樓展開對內閣大庫檔案的整理。¹⁴從民國十八年到今天，史語所內閣大庫檔案的整理工作或斷或續已經進行

¹⁰ 以上見李光濤，〈序〉，《明清檔案存真選輯初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7），頁1-2；關於當時新舊學者史料眼光的差異，參見王汎森，〈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

¹¹ 《史料叢刊初編》一書所收史料二十二種並非全部得之內閣大庫檔案。據李光濤先生指出，其中〈天聰朝奏疏冊〉即非大庫之物，而是轉錄而來，惟羅振玉並未交待轉錄來源。見李光濤，《明清檔案存真選輯初集》，〈序〉，頁6。

¹² 關於這部份內閣大庫輾轉換手的詳情，參見徐中舒，〈內閣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再述內閣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

¹³ 《史語所發展史稿》，頁195-198。

¹⁴ 徐中舒，〈內閣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頁14。

了七十年。史語所這七十年間的整理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¹⁵

第一個階段是民國十八年到二十三年。民國十八年九月，平津兩地的檔案都運至歷史博物館午門樓上後，徐中舒先生就領著書記尹煥章、李光濤二位先生以及二十餘個助手，分成六組，在西翼樓展開了內閣大庫檔案的初步整理工作。¹⁶根據徐先生的敘述，當年的整理工作，分成幾道程序。¹⁷第一是去灰。大庫檔案由於年代久遠，加上又經數次遷移，貯存地方都不甚理想，因而積塵甚厚，除塵成了整理的第一部工作。李光濤先生曾經估計，這些除下的灰土大約重一萬二千斤，可裝一百二十餘袋。¹⁸其次是鋪平。除了塵之後，每件檔案必須逐一鋪平。第三是分類。分類的工作又可以分成二部份，先是將檔案依外形分類，將同類的檔案歸在一處；而後再將同類的檔案，按朝代的先後次序，各為一類。第四是將分類完的檔案用麻繩捆扎。第五是將剩餘的破碎檔案裝回麻袋，留待日後再作處理。第六是裱褙。一些破碎但重要的文件則需隨時裝裱。有些殘件往往因拼接裱褙的結果，而復原成完整的文件。徐先生指出，李光濤先生在這方面有很大的貢獻。最後一項的工作就是鈔錄副本。由於在整理檔案之初，傅先生就有「不待整理完功，先分期刊行之」的決定，¹⁹在整理檔案的同時，

¹⁵ 我曾於二年前（民國八十五年）在「兩岸古籍整理學術研討會」上，以〈史語所《明實錄》與內閣大庫明清檔案的整理〉為題，報告史語所歷年來整理內閣大庫檔案的經過及出版情形。由於該份報告一直未見刊出，所以這一部份主要依據該份報告略作增刪。

¹⁶ 關於內閣大庫明清檔案的整理，徐中舒先生有詳細的說明，請見前引〈內閣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再述內閣大庫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二文。

¹⁷ 徐中舒，〈再述內閣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頁 543-544。

¹⁸ 李光濤，〈記內閣大庫殘餘檔案〉，頁 513。

¹⁹ 傅先生的理由是：因為「國內學人近年已甚注意檔案一類之直接史料，不早刊佈，無以答同祈求者之望。且校訂考證之業，參加者多，成功益

就已選擇重要的摺件鈔錄副本，以利日後編纂。當民國十九年一月「明清史料編刊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時，就已鈔錄了「年代較早較重要」的檔件約四十萬言。在那次會中正式議決「凡已經整理之檔案依年代先後編次，即行付印；以後陸續整理付印，俟全體完竣後，再編索引以便檢查。」會中並通過陳垣先生與傅斯年先生的兩項建議。陳先生建議：「印行之檔案宜名：『明清史料』。」傅先生則提議：「所有檔案用五號字排印。每本百葉，以干支爲次第，如明清史料甲集、乙集，以至戌集、亥集。每集共十本，計一千葉，以便檢查或編製索引之用。」²⁰民國十九年九月，初步的整理工作大功告成，而《明清史料》甲編第一本也在這時印出。

到了二十一年初，分類整理的工作也完成了十分之八九；同年年底，「所有已整理的檔案，全已上架，雖未編號登記，然重要檔案件，已有簡明目錄可查。」²¹依據徐中舒的看法，這時的內閣大庫檔案「已可按年索求，供研究之用。」²²而史語所的確也在這時準備開始利用檔案作研究的工作。²³可惜，整個計劃因日本入侵長城，進逼平津，

美。若先將『生材料』按月刊布之，則據以工作者不限吾等，憑作參考者不分地域。於是不待整理完功，先分期刊行之。非敢草率將事，正以求其友聲云爾。」見〈明清史料發刊例言〉，《明清史料》甲編第一本；亦見《傅斯年選集》第四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頁357-358。）

²⁰ 〈明清檔案編刊會第一次會議錄〉。

²¹ 我們在檔案中發現九本以毛筆書寫，紅色十行紙、青藍皮裝訂之目錄冊。這可能就是當時的「簡明目錄」，因為其中一本的頁緣上有「歷史博物館」等字樣，同時有些條目上尚有「入陳列室」等字樣。這九本目錄冊分別是：(1)《清帝敕諭編號簿》第一、二、三冊（計2075件）。(2)《敕諭編號簿》（計657件）。(3)《清各種賀表編號簿》第一、二、三冊（計3325件）。(4)《明清檔案編號簿》二冊（計793件）

²² 徐中舒，〈再述內閣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頁545。

²³ 他們計劃先「編成清初四朝紀年長編，及四朝紀事本末兩種底稿，以為

而告中斷，因史語所決定將大部份檔案與圖書古物全都裝箱南運。二十三年，由於華北局勢轉穩，而且南方潮溼，不利檔案的長久保存，又將檔案遷回，存放北海蠶壇內。次年一月，決定《明清史料》復刊，乙篇、丙篇各十本由上海商務印書館相繼刊行。但是，隨著局勢轉壞，傅先生命李光濤先生將檔案擇要裝了一百箱，與圖書古物再度南運，整理的工作再告中止。

這一百箱檔案隨著史語所由長沙遷昆明，由昆明搬李莊，由李莊回南京，最後由南京到了台灣。民國四十年四月，當時的所長董作賓先生認為當年整理檔案限於經費，僅作初步的分類，未能確實紀錄每類的件數，似乎未盡到妥善保管檔案的責任，於是「特命全部開箱，逐箱清查件數及重新辦理登記。」²⁴清查結果，全部九十九箱摺件檔冊共計 311,914 件。這個數目字也就成為史語所內閣大庫檔案總數的正式統計數字。不過，這次清查工作似乎也僅止於統計件數，並未進一步做檔案登錄的工作。事實上，一直到李先生民國六十四年退休為止，史語所都因限於經費只能有限度地進行檔案登記的工作。三年前，當時的傅斯年圖書館主任，也是史語所的研究員柳立言先生，在他辦公室的鐵櫃中翻出了李先生的檔案登記簿，上面登錄了八千〇九號的順治朝的題本、揭帖；同時最近我們也發現若干檔案是放在印有「史語所內閣大庫殘餘檔案」標題的牛皮信封裡，封面上寫有該檔案的具奏時間、摘由與整殘狀況。除此而外，我們沒有找到任何有關檔案登記的紀錄。顯然，在這段期間，李先生除了埋首於明清史的研究

研究清初史的骨幹，凡檔案中與此中史事有關係的，皆附綴每年每事之末，以為比勘之用。同時並中止《明清史料》之刊行，擬待所有檔案編號編目以後，再分類編輯出版。」見徐中舒，〈再述內閣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頁 546。

²⁴ 李光濤，〈記內閣大庫殘餘檔案〉，頁 522。

工作外，一直都是像他自己所說的，「奉傅先生的遺言遺意，努力於刊布明清史料的工作。」從民國四十二年到六十四年，史語所的《明清史料》一共發行了戊、己、庚、辛、壬、癸等六篇，合計六十本。另外也出版了《明清檔案存真選輯》初集、二集、三集。這可以說是史語所整理內閣大庫檔案的第二個階段。

第三階段是史語所真正有規模整理內閣大庫檔案的開始。民國七十年十月，在丁邦新所長的推動下，由張偉仁先生負責策劃執行，先從藏量較多的題、奏本開始入手，冊檔則暫緩。²⁵這次整理與前次最大的不同是：每件本子在鈐印編號後，影印複本兩份，而後封存上架，非有必要不再拆開；影印的複本則供日後編輯出版及研究人員借閱之用。這樣一方面既達到了保存檔案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方便了學術研究。這當然是拜現代科技之賜，有了便利的影印機可供應用。民國七十四年，委由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開始逐年分批影印刊行這些史料。這個出版計劃原先的構想是：每月印行五冊，計一千個文件，約三千頁。不過，後來聯經公司因為種種因素減緩了出版的腳步，目前的出版進度是：已出版三百二十四冊，三百二十五至三百七十冊即將出版，不過據悉會以光碟，而非紙本的方式出版。

四、現階段的整理

從民國八十四年迄今是內閣大庫檔案整理計劃的第四個階段。八十四年年初，再拜科技之賜，整理計劃又作了二項調整。首先，在保存檔案方面，不再影印複本，而改以影像掃描或數位照像的方式，將

²⁵ 關於張先生整理計劃的細節，請見他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存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第一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的序文。

檔案原樣存入光碟。若以 650MB 的光碟片計，每個光碟約可貯存二千件摺檔，相當於從前紙本《明清檔案》十冊的數量。這樣的改變不僅可以節省貯存複本的空間，更重要的是，今後無論是在編輯出版或提供研究者的服務上，都可以節省可觀的人力、物力。未來如要出版檔案，可以直接在光碟片的影像檔上作業，甚或就以光碟的形式出版。

其次，我們也為每件本子，包括先前出版之《明清史料》、《明清檔案求真選輯》等，撰寫一個提要，內容包括——

事由：即該件檔案內容的摘要。

時間：即該件檔案發下、進呈或移會的時間。

職官：即該件檔案上奏人的官銜與姓名。

冊別件號：即該件檔案全文收錄之所在。

登錄號：即民國七十年以後，登錄檔案的流水號。

文件別：即該件檔案的類別，如題本、奏本、奏摺、
史書等。

備註：即檔案整殘狀況及以上各項的補充說明。

其中具奏事由一項，以不超過六十個字為原則，具體交待該件本子所涉及的人、事、地、物等資訊。我們希望能透過提要中的事由、時間、職官等項目，配合現代的電子檢索工具，能協助研究者迅速有效地找到他們感興趣的檔案。

在過去，分類與製作索引一向被認為是檔案整理的必要手段，因為一方面便於管理，另一方面也方便研究者使用。史語所當年在整理檔案時曾將檔案作分類。先是將檔案依外形分類，將同類的檔案歸在一處；而後再將同類的檔案，按朝代的先後次序，各為一類。這裡所謂的依外形分類，指的是按照當時的公文種類分類，同一類的公文，如明題行稿、清題本、奏本、賀表、奏銷冊等，外形大致一致，將它

們分爲一類。根據張偉仁先生的記載，民國七十年整理檔案時，曾計劃依檔案的性質分類，並製作索引。當時預定的索引項目有製作官司、製作官員、製作時間、案發地點、涉案人員、事件性質、處理辦法、所據典章等八項；其中事件性質一項即是要依檔案的性質分類，當時的構想是以《大明會典》與《大清會典事例》內的分類爲依據，可是後來並未付諸實施。²⁶

然而，在今日有強大電子檢索工具支援的情形下，索引製作似乎已無必要。因爲利用我們製作的提要，透過電子檢索工具，研究者就可以很快地找到所需要的檔案。提要中的時間、職官兩項其實就相當於三個索引——時間、官銜與人名；而事由項的內容在相當程度上也等於一個分類索引，只是分類項目需要使用者自己斟酌。換而言之，在目前的電子檢索系統下，使用者只要依研究題目所需，以提要中的任何字或詞爲條件，就可以很快找到所需要的檔案。

不過，由於這樣的檢索都是利用使用者鍵入的自然語言爲條件，一旦涉及同義詞、同人異名、古今地名等問題，就會影響檢索的正確性。在這種情形下，爲了協助研究人員更有效率地使用內閣大庫檔案，同義詞、同人異名、古今地名對照表等輔助性工具的提供，仍有其必要。因此，我們計劃從明年開始，先從台灣史料部份入手，逐年進行相關標題、人名、地名等權威檔 (authority files) 的建置，以提高檢索結果的有效性與正確性。

到本年 (1998) 六月底爲止，史語所已完成檔案登錄的有十五萬四千多件，完成掃描的有五萬八千多件，寫完提要並上網的有九萬八千多件。目前研究者可以經由網際網路 (Internet) 上到史語所「內閣大庫

²⁶ 張偉仁，〈序〉，《明清檔案》第一冊，頁 12-14。

檔案」的網頁，²⁷利用我們提供的電子檢索系統，以提要中的任何字或詞為條件，檢得所要的檔案出處或登錄號，再去翻閱《明清史料》、《明清檔案》等原出版品或申請調閱原件。如果檢出的部份已經有了數位影像檔，則可在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透過雷射印表機印出。將來如果時機成熟，研究者甚至可以坐在自己的終端機螢幕前閱讀所檢得的檔案，也可以透過雷射印表機就近印出所要的檔案。

五、檔案內容

根據當年徐中舒初步整理後的估計，在史語所所藏內閣大庫檔案中，明代檔案數量很少，約有四千多件，多為康熙年間為修明史徵集而來的，以啓禎年間的題行稿居多；清代檔案則佔最多數，其內容計有：（一）內閣收貯的各項檔案，如制詔誥敕、題奏表箋啓本副本帖史書錄書塘報、黃冊及其他隨本進呈及繳存的文件、朝貢諸國表章等；（二）內閣本身的各項檔案；（三）修書各館檔案；（四）試題試卷及其相關的檔案；（五）瀋陽舊檔。²⁸而今在檔案數量只剩下「四分之一弱」的情形下，²⁹其內容又是如何呢？

就目前整理所見，明代檔案有三千一百多件，實際數目應不止此數，因為尚有部份明代檔案尚未整理。誠如徐中舒所見，史語所藏明代檔案以行稿或題行稿居多，多屬於萬曆、天啓、崇禎三朝，而在目前整理好的明代檔案中，萬曆朝有五件，天啓朝五十件，崇禎朝則有三千多件。其餘較早期的檔案多為敕諭，如史語所內閣大庫檔案中時

²⁷ 內閣大庫網頁網址為：<http://saturn.ihp.sinica.edu.tw/~mct/>。

²⁸ 徐中舒，〈再述內閣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

²⁹ 這是張偉仁先生的估計，見張偉仁，〈序〉，《明清檔案》第一冊，頁3。

間最早的二件就是宣德二年（1427）的敕諭，³⁰時間稍晚的幾件也都是正統、成化年間所頒的敕諭。³¹

在這些敕諭中，有一本敕諭抄件冊——《巡按浙江試監察御史臣王應昌謹造完浙省各衙門明朝敕諭文冊》——值得一提。順治三年正月，清政府應山東巡撫丁文盛的奏請，為「詳明職掌，以便專轄」，下令要求各地方文武官員奏進在明朝所領敕諭及其副敕抄謄冊案。順治三年八月，浙江巡按試監察御史王應昌於是將浙江省所存傳敕七道、杭嚴道傳敕一道，以及清軍督冊道、驛傳道、水利道、兩浙運司衙門抄敕各一道造冊繳進。這件文冊不僅為我們保存了十二件珍貴的明代檔案，而且也透露出清政府在朝代遞嬗之際，為鞏固政權所採取的措施。

此外，史語所也藏有幾件明代的冊檔。其中比較有價值的是武職選簿與實錄殘本。武職選簿記錄了明代衛所武官世襲武職的家族經歷，是瞭解明代衛所武官制度的重要史料。史語所藏有《銅鼓衛選簿》，以及一些其他衛所的殘頁。³²至於實錄，史語所檔案中有明內閣進呈熹宗實錄的散頁，以及憲宗、世宗、神宗實錄抄本散頁，數量都不多。熹宗實錄今存紅格本缺十三卷，由於這些散頁的發現，傅孟真先生就想從散頁中找尋缺卷，並改正紅格本的脫漏及誤字，史語所

³⁰ 俱見《明清檔案存真選輯初集》，圖版1、2。

³¹ 正統八年（1443）與十三年（1448）的兩件，見《明清檔案存真選輯初集》，圖版3、4，另一件同為正統十三年敕諭則尚未出版，登錄號是038109；成化年間的一件也未出版，登錄號是038111。

³² 史語所同事于志嘉女士曾利用這批選簿對日本學者川越泰博的研究提出糾繆，參見于志嘉，〈明武職選簿與衛所武官制研究——記中研院史語所藏明代武職選簿殘本兼評川越泰博的選簿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1（1998）：45-70。

於是就開始校勘《明實錄》。³³

就清代檔案而言，以上五項檔案在史語所現存檔案中仍可見到，只是數量可能較前減少一些。以下就這五項分別說明目前整理所見。

(一) 內閣收貯的各項檔案，如題奏、制誥、史書、錄書、黃冊等

清代中央各部及地方各省官員向皇帝言事都用奏本、奏摺與題本。這些題奏本章及其抄件在史語所檔案中居最大宗。在史語所已寫有提要的九萬八千多件檔案中，題本就佔了五萬多件，超過總數的一半，而它的副本，也就是揭帖也有一萬多件，奏本與奏摺合計也是一萬多件（包含副奏、奏副、奏稿、奏底、奏片等）。³⁴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三種檔案中都有一些封面上寫有「密題」、「密揭」、「密奏」字樣的本子。觀其內容多與人事有關，除此並無特異之處。根據我們對清代題奏制度的瞭解，題本多由通政司轉承，由於無法保密，遂有奏摺制度的發明。今日所見這些密題、密揭、密奏是如何送進內廷呈覽，以及它們在奏摺制度演變過程所扮演的角色，也許值得我們注意。

除了揭帖、題副、奏副外，史書（明代稱六曹章奏）、錄書也是題奏本的副本。前者供史官記注，後者則由六科抄出，儲以備編纂各類書籍之用。史語所現有康熙朝的史書、順治朝吏、禮、工等科的錄書，³⁵以

³³ 黃彰健，〈校印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本明實錄序〉，《明實錄附校勘記》（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頁1。

³⁴ 此處奏、奏本與奏摺合計是因為順治十三年至乾隆十三奏本與奏摺共存期間，許多本子封面僅有一「奏」字，若要區分奏本與奏摺，必須逐件細究文件格式始能分辨，目前我們限於人力，尚未進行是項工作。

³⁵ 我們在檔案中見到一本順治朝二年五月的吏曹章奏。名稱仍用明代之舊。

及明崇禎朝的吏曹章冊殘檔各若干本。此外，我們也看到一些題奏本的抄件，有單件的，也有裝訂成冊的，可是因為大部份封面未書名目，一時之間還不容易查得它們的名目。這些都可以補題奏本原件不在的缺憾。

題奏本既是清代中央各部及地方各省的公文書，內容多涉及一般行政事務，而有些並不見於會典或則例，對研究制度史的學者而言，是相當有價值的材料。此外，在涉及刑案的題、揭中，也有不少有關一般基層社會生活的資料，舉凡地方保甲、夫妻感情紛爭、男女愛慾糾葛、土地買賣、牙行慣例、市集活動、民間借貸、起會等等。遺憾的是，這些口供資料都經過了官員的整理，缺乏西方同性質資料的深度，研究者若要有效的利用，還得費一番巧思。

敕諭是皇帝頒給地方重要文武官員任官的憑證。依官員職級的高低，敕諭可給分爲坐名敕與傳敕；前者寫明官職姓名，後者則只列銜名。史語所藏有這兩種敕書二千多件，然以坐名敕居多，爲清代地方行政制度史的研究提供了相當重要的資料。另外史語所也藏有一些詔書與誥敕。其中順治十八年下詔罪己與康熙六十一年傳位皇四子的二份遺詔是比較特殊的二件。前者涉及清初朝廷當權派與保守派的權力的鬥爭，³⁶而後者則與雍正是否奪嗣的論爭有關。這些詔敕大都經過裱褙，有些裱工還相當考究，應該是當年整理檔案之初就著手做的，由此可以想見當時對這些文件的重視。

徐中舒先生說，史語所藏有各衙門年終奏銷清冊，也就是黃冊，約有二千餘冊。由於比較完整的本子——計有二千三百七十九本——已在民國二十四年六月統交當時的中研院社會研究所負責整理保

³⁶ 王戎笙，〈順治遺詔與清初權力鬥爭〉，清史論叢編委會編，《清史論叢》（瀋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4），頁158-163。

管，³⁷這類冊檔在史語所所餘不多，而且多屬零散破爛的本子，使用起來並不容易。數量比較多的，就數各朝不同年分的《盛京戶部恭造考成黃冊》、《奉天府奏銷退圈地畝錢糧冊》，以及刑部各司《朝審緩斬絞犯婦案件黃冊檔》。此外，也有一些內務府各莊頭、園頭呈報的地畝清冊。

除了地畝錢糧清冊外，史語所尚有二份丁口清冊民數，也就是所謂民數冊，不能不提。有清一代，從乾隆六年（1741）起直到清末，各省督撫每年年終必須分別繕寫黃冊，匯報戶部全省民數與穀數；戶部再彙整各省的資料，造具民數穀數清冊，呈上御覽。³⁸據美國學者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指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有十二個年分四川督撫所造報的《四川通省民數冊》。他對其中九個年分的本子作了詳盡的分析。³⁹這九本民數冊最早的繕造年代是道光二年（1822），最晚的年分則是光緒十三年（1887）。⁴⁰史語所所藏民數冊也是由四川省所造報的，只是年代不同，一是乾隆六十年分，一是光緒三年。施氏指出，僅就民數冊中前後年分數字增減變化的一致性，就足以論定：道光二年以下民數冊上的數字並不是實際調查得來的，而是地方

³⁷ 李光濤，《明清檔案存真選輯》初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9），〈序〉，頁15。

³⁸ 目前所見，最晚的一本戶部彙題民數穀數清冊是光緒二十四年造報的。

³⁹ G. William Skinner, "Sichuan's Popul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essons from Disaggregated Data," *Late Imperial China* 8.1 (1987): 1-79。在施氏所獲得的民數冊中，其實尚有光緒二十一年（1895）、三十一年（1905）、三十二年（1906）等年分的資料，但因質量不佳，而被排除。（見前引文，頁5，註6）

⁴⁰ 其餘的年分分別是：道光八年（1828）、九年（1829）、二十五年（1845）、二十七年（1847）、三十年（1850）、咸豐二年（1852）。

胥吏依據嘉慶十七年（1812）的數據造假的結果。⁴¹由於施堅雅並未找到嘉慶十七年的民數冊，他在文中所引用的數據只是《四川通志》上的數字，那些數字是否即為施氏所認定嘉慶十七年的人口數，尚有若干疑點待澄清。而史語所藏的《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數冊》不僅在時間上較《四川通志》為早，而且是原始的奏報數字，應該可以提供學者對清初四川的人口數作進一步的探究。⁴²

根據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十五，八旗世爵家譜各該旗每十年應增修一次，送內閣交滿本房收貯，以備世爵官如有遺忘世系，或所得佐領緣由不明時檢查。史語所藏有十數本各旗所造報佐領緣由冊。其中包括三藩之一靖南王耿仲明的。

此外，在檔案中也看到一種較題奏小許多的本子，約十八公分長，九公分寬。上面記滿了人名，封面多有「摺本」字樣。⁴³這種摺本的作用未見前人提及。

（二）內閣本身的各項檔案

根據《光緒朝會典》，內閣下設典籍廳、滿本房、漢本房、蒙古房、滿票簽處、漢票簽處、誥敕房、稽察房、收發紅本處、飯銀庫、副本庫、批本處等十二房處。⁴⁴史語所或多或少都藏有這十二房處的

⁴¹ G. William Skinner, "Sichuan's Popul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14.

⁴² 個人曾對這份民數冊上人口數字做過初步考察，真實性頗高，參見拙著，〈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資料檢討：史語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數冊》的幾點觀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品委員會編，《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頁301-327。

⁴³ 其中有一本作「滿本堂京察人員履歷手摺」。

⁴⁴ 《光緒朝會典》卷二。

檔案。

典籍廳是內閣的秘書部門，又分南、北兩廳。史語所有不少有關兩廳的檔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十冊封面載有道光某年某月北廳或道光某年某月南廳《綸音》的本子，⁴⁵以及咸豐八年二、三、五月、九年五月《上諭》的本子。不過，根據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十五，「凡紀載綸音，分爲三冊。每日發科本章，滿漢票簽處當直中書摘記事由，詳錄聖旨爲一冊，曰絲綸簿。特將諭旨，別爲一冊，曰上諭簿。中外臣工奏摺奉旨允行，及交部議覆者，別爲一冊，曰外紀簿，以備參考。」顯然除了滿漢票簽處外，內閣典籍廳也有按日紀載綸音的本子。史語所另有一本滿票簽同治九年五月分《上諭檔》。此外，尚有十數冊同性質的本子，由於封面殘缺，無法確定究竟是那一個衙門的上諭抄件。

稽察房是內閣專爲清帝檢查、催辦、匯報各部院衙門執行上諭情況的機構。史語所藏有不少各機關每月造報已結未結遵旨議覆事件、上諭及摺奏事件清冊。遺憾的是，這類檔冊頗爲零散，殘缺之處也多，使用起來並不方便。

然而，如果對內閣機構的日常運作有興趣，史語所所藏典籍南、北二廳的《考語》、《考勤簿》、《輪值冊》、《簽名簿》，稽察房的《逐日該班檔》、《值日檔》，以文移處的《茶房銀單》、紙庫的《收掌官單》可能會有幫助。

⁴⁵ 除了一冊道光十一年十二月北廳綸音的本子外，其餘的九冊都是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南北廳綸音。

(三) 修書各館檔案

清代設館修書極為盛行。徐中舒將它們分為三類：「一曰例開之館，如實錄館玉牒館。二曰長開之館，如內廷三館，即武英殿國史館方略館。三曰特開之館，如會典館一統志館明史館明紀綱目館三通館三禮館奏議館文穎四庫全書館八旗志書館。」⁴⁶除了國史館外，這些修書各館均非常設機構，一旦閉館，所有檔冊、成稿均交內閣收存。⁴⁷史語所所藏的檔案多為實錄館、起居注館、會典館、一統志館、明紀綱目館與明史館等館所修諸書。不過，完整的並不多，且以稿本居多。

以實錄而言，目前所見多為清初太祖、太宗、世祖三朝的稿本。這三朝實錄都歷經多次重修或改定。《太祖實錄》初纂於崇德元年，康熙二十二年重修，雍正十二年復加改定，乾隆四年完稿。史語所現藏有康熙重修時一次本、二次本等各種稿本十一冊。⁴⁸《太宗實錄》順治九年奉敕修，康熙十二年重修，乾隆初改定；史語所現藏稿本多屬康熙重修時不同階段的本子。《世祖實錄》初纂於康熙十一年，雍正十二年世宗復令「重加校訂」，而於乾隆四年改定完成。康熙時修的初纂本現不得見。史語所現藏有若干當時初修時不同階段的幾種稿本，有底本、一次改正本、二次改本、三次真本等。除了這三朝實錄外，史語所尚有若干冊太祖、太宗、穆宗、文宗聖訓殘本。

清代於康熙十年設起居注館，分別以滿、漢兩種文撰寫起居注。史語所目前所藏漢文起居注也以康熙朝為主，惟全都是稿本，每月一

⁴⁶ 徐中舒，〈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檔案的分析〉，頁 204。

⁴⁷ 喬治忠，〈清代國史館考述〉，《文史》39(1995)：191。

⁴⁸ 方甦生曾根據這些稿本及羅振玉所刊行的三種稿本與崇德本對較，參見方甦生，〈清太祖實錄纂修考〉，《輔仁學誌》7.1、2：65-99。

冊，計有康熙十二、十四、十九、二十一、二十四、三十一、三十九、四十二、四十三、五十三、五十四年各月殘本五十四冊。漢文起居注正本目前分別收藏在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與台北故宮博物院。由於漢文本康熙起居注已有殘缺，即使合兩地收藏亦不能得其全貌，史語所的收藏除了可供比對，以瞭解正本的去取標準外，還可以稍稍彌補正本殘缺的缺憾，如康熙四十三年之正本，據瞭解一檔館與台北故宮均不得見，而史語所藏有四十二年元月、三月、八月、九月、十一月、十二月的稿本。不過，史語所尚藏有一本題作「攝政親王起居注」的抄本，由於順治時尚未設起居注館，民國二十二年故宮文獻館出版時改作《多爾袞攝政日記》。

清代於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光緒朝五次纂修會典。史語所所藏會典館檔案多屬乾隆朝修纂會典時之各式稿本，計有清稿、副本、正本等數十冊。另外也有一些各機構為修會典而進呈的應入會典清冊，如《江寧織造衙門造送應入會典事宜》、《盛京工部應入會典事宜》、《鴻臚寺冊送本寺衙署規制及龍亭匾額等項》等。康熙、雍正兩朝之會典均將具體事例附於相關法條之下，然乾隆朝之會典則僅載法典，而將事例另外撰成《大清會典則例》。史語所也有若干撰寫則例時之各式稿本。

清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國史館正式開館。根據喬治忠的研究，其主要工作「在於為開國功臣作傳」。⁴⁹史語所現有十多本封面題有《功臣傳》、《名臣傳》、《吏部功臣檔》、《三朝國史功臣實績》的本子。觀其內容，均為清初三朝實錄的摘錄，顯然是當時修傳的底本。

國史館的另一項工作是纂修各種史表。史語所藏有順治、康熙年間修纂的總督巡撫年表、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及理藩院、都

⁴⁹ 喬治忠，〈清代國史館考述〉，頁181。

察院尚書侍郎年表、內閣大學士學士年表稿本十一冊。

清代第一部一統志是於康熙二十四年奉敕修，乾隆八年完成。⁵⁰史語所藏有此書有關朝鮮、安南、奉天府、南籠府等地之稿本十數冊。

根據《清史稿》，《欽定方輿路程考略》是於康熙時由汪士鋐等人奉敕修。⁵¹不過，美國學者 Timothy Brook 指出，此書於乾隆時重修過，但從未出版。⁵²史語所藏有直隸省廣平府、湖北省荊州府、宜昌府、湖南省靖州直隸州、山東省東昌府、陝西省西安府、河南省懷慶府、河南省歸德府、廣東省韶州府、江西省撫州府、九江府等部份縣份的本子，計十一冊。⁵³

除了修書各館的檔案外，內閣大庫尚有當年為修書而向各方徵集而來的檔案。徐中舒先生認為，這一類的檔案在混入其他檔案之後，除了前述明檔等較為特殊的檔案外，大半已無從分辨了。⁵⁴不過，史語所目前所見接近百冊的乾隆年間各縣造報的節烈婦女事蹟清冊、二十餘冊的家譜、世職譜、十餘冊的墓誌銘、碑銘，以及少數詩文集、年譜、奏疏，如《敦本堂年譜擬略》、《魏象樞等奏疏抄檔殘冊》等，應該都是為修各種志書向各方徵集來的。

⁵⁰ 馮爾康，《清史史料學初稿》（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6），頁122-123。

⁵¹ 《清史稿》，卷146〈地理志一二〇〉：4287。

⁵² Timothy Brook, *Geographical Sources of Ming-Qing History*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p. 31.

⁵³ 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庫藏有陝西省慶陽府、鳳翔府部份縣份的本子二冊。該館其實尚藏有浙江省金華府、天台府、處州府等部份縣份的本子，計十冊。不過，是以《浙江方輿路程考略》為書名登錄。

⁵⁴ 徐中舒，〈再述內閣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頁565。

(四) 試題試卷及其相關的檔案

據徐中舒先生當年的描述，史語所檔案中試題試卷「僅存數冊，而破爛者尚居多數」，不過經過初步整理，我們發現史語所這類檔案的收藏數量並不少，計有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等朝的文武鄉、會試題名錄、試題、試卷三百多冊；雖然破爛者居多，但也有不少完整的本子。其中比較罕見的是一些未經謄錄的會試、殿試卷原本。這些本子形式與題奏本類似，但稍長，也寬些，約有 37.5 至 40 公分長，12 公分寬。每本試卷分為二個部份，前面十一幅是供考生起草之用，首幅右上角有「草稿起」，末幅左上角則有「草稿至此以便彌封」字樣；後面三十三幅則是正式作答之用，每幅有六行紅色格線，方便書寫作答。因此，無論就試卷形式或試題內容，學者應該可以利用這些資料做些研究。

此外，史語所也藏有一些西番館、回回館、百譯館、西天館、暹邏館、俄羅斯館等譯字生的試卷。試題都是相關外文字詞的漢譯。

(五) 瀋陽舊檔

清人入關以前之文書多以無圈點之老滿文書寫。史語所這一面的檔案並不多，而且多已出版，收錄在《明清檔案存真選輯》初集、二集。至於漢文資料也不多，但都很重要，如〈袁崇煥致金國汗書〉、〈金國汗答袁崇煥書〉、〈毛文龍致金國汗五書〉等，多收在《明清檔案存真選輯》初集、三集與《明清史料》甲編第一本、第七本。另外少數新滿文檔冊、殘頁尚待整理。

最後要特別指出一點，上述內閣大庫檔案中也有不少事關台灣的

史料。李光濤先生在其所編《明清檔案存真選輯》初集中即立有「台灣史料」類目，收錄相關檔案實錄、題、揭、奏、敕諭等影本二十件，而《明清史料》戊編、己編，以及《明清檔案》中也都收錄許多相關台灣史料。民國八十六年，我們將這部份檔案及尚未出版的有關臺灣史料的提要匯集成冊，編入台灣大學歷史系主編之《台灣史檔案·文書目錄（十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有關臺灣檔案》出版，收錄提要三千三百六十九筆，除去重複部份，則有二千五百〇五筆。

六、結論

從民國十八年史語所購入內閣大庫檔案迄今，匆匆已是七十個年頭過去，而內閣大庫檔案的整理工作尚在進行。檢討這段歷史，先有對日抗戰，後有國共內戰，時局動亂，使得整理工作為之中輟，應是這項整理工作曠日費時的主要原因。當史語所民國七十年有能力較有規模的整理檔案時，上距已有簡明目錄的年代已是五十個寒暑過去。更可歎的是，當年史語所前輩在午門辛勤工作的成績，已全然付諸流水，一切必須從頭開始。這不僅在人力、物力與時間上是莫大的損失，而對明清史研究工作的進展，更是難以彌補的傷害。

傅斯年先生當年決定購買內閣大庫檔案，是著眼於這批材料是研究明清史最直接的史料。他在為購買檔案而致蔡元培先生的信中指出，大庫檔案「其中無盡寶藏，蓋明清歷史私家記載，究竟見聞有限，官書則歷朝改換，全靠不住，政治實情，全在此檔案中也。」⁵⁵傅先生對內閣大庫檔案期望之高可以想見。有盼望，難免有失望。李濟先

⁵⁵ 李光濤，〈記內閣大庫殘餘檔案〉，頁 525。

生在他的《感舊錄》中曾提到他與傅先生有關檔案的一段談話：

記得有一次在北海靜心齋與孟真先生閒談，說起午門檔案整理工作，他頗有點失望的表示。問他為何有此不滿，他說：「沒有什麼重要的發現。」我聽了有些不大懂他的意思，因再問他：「什麼叫重要發現？難道說先生希望在這批檔案內找出滿清沒有入關的證據嗎？」他聽了為之哈哈大笑，從此再不說這件事了。⁵⁶

傅先生顯然原本期望從檔案中找到可以改寫明清歷史的重要「政治實情」，他沒有找到這樣的材料，難免失望。然而，李濟先生的反問無疑點中了他的心事。傅先生沒有因為在檔案中找不到他需要的材料，而減低他對這批檔案的重視。否則，史語所後來也不會積極刊布這批資料了。其實，任何文件有無史料價值，實繫於研究者有無提出相關的問題。有問題的提出，史料才有說話的餘地。心頭沒有問題，再有價值的材料也可能視而不見。史語所當年購買內閣大庫檔案就是要用新的眼光、新的材料、新的方法來從事歷史的研究。史語所前輩，如李光濤、黃彰健先生也的確利用這批材料做出了可觀的成績。這批檔案是否能繼續對明清史研究做出貢獻，就看我們是否能夠提出新的問題、新的觀點來利用這些材料了。

蔡元培先生在《明清史料》發刊的序文中說到：「我們整理這些檔案，在將來可以有多少成績，目下全不敢說，只願做這事業的精神，引出些研究直接史料，比核公私記載，而不安於抄成書的同志。這便是我們最大的安慰。」我現在稍稍更動幾個字，以作為本文的結束——我們整理這些檔案，在將來可以有多少成績，目下全不敢說，只

⁵⁶ 李濟，〈傅孟真先生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感舊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57），頁82-83。本資料承同事王汎森兄提示，特致謝意。

願做這事業的精神，引出些有心善用這批史料的研究者。這便是我們最大的安慰。

The Grand Secretariat Archives at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Cheng-yun Liu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archival materials at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are portions of the Ch'ing Grand Secretariat Archives rescued from being recycled at a Peking paper factory. This paper intends to introduce the preservation, cataloguing, and publication of these documents since their acquisition by Fu Ssu-nien in 1929. Some of their contents will also be discussed.

Despite of earlier efforts, a full-scale project for restoring and organizing these archival materials only began in 1981 and has continued to the present day. As of June 1998, approximately 154,000 documents have been registered, 98,000 have been catalogued, and 36,000 have been scanned. Those catalogued and scanned documents are available for computer retrieval (in Chinese) through the Internet by searching for any terms related to date, office or name of memorialists, and subject.

This collection consists largely of routine memorials, *t'i-pen*, their copies, *chieh-t'ieh*, as well as edicts, record books, veritable-record drafts, *shih-lu kao*. These documents will probably be most useful to scholars interested in institutional history. Nevertheless,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ians may be surprised to find how rich these materials in researching certain topics.

Key Words: Grand Secretariat Archives, Ming-Ch'ing Archives,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